

理论探索

先秦儒家话语形构与“周孔之道”述论

李 燕

(北京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人文学院 北京 100120)

摘要 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看,“周孔之道”的生成关乎先秦儒家的话语形构。春秋中后期以来,面对现实危机与变革需求,诸子纷纷建言立说,并围绕“圣人救世”的思想主张交相驳难。其中,儒家作为观察、感知、记录和教化的主体,通过描述、阐发和辩论等方式形构“圣人之道”话语。随着周、孔形象渐趋圣化,以“六经”为核心的古代典籍成为儒家经典并取得权威地位,“周孔之道”也得以在儒家的话语运作中被表达出来。

关键词 周孔之道;先秦儒家;话语形构;圣人;“六经”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8X(2016)04-0029-06

DOI 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6.04.005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周孔之道”曾长期以儒家思想代名词的身份存在。事实上,它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与其密切相关的则是周、孔圣人形象和经典权威地位,其间伴随着冲突、矛盾与非连续性,而这一过程正与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中关于话语分析的描述相吻合。职是之故,本文尝试借用其理论,基于先秦儒家话语形构的视角,通过周孔形象的圣化和经典权威的确立,勾勒“周孔之道”在先秦时期衍生、扩散和演化的历史,以期进一步认识早期儒家传统的丰富多样。

一、周、孔“圣人”形象的塑造

按照福柯的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discourse)所组成,这里所谓“话语”,是指某一社会团体根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确立于社会中,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交会的过程。当然,话语运作总是有“迹”可循的,这个“迹”也就是福柯所称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春秋中后期以来,先秦儒家针对社会危机提出自己的“圣人”观,周、孔也得以在其间显现其意义。对此,有必要结合周、孔形象圣化的历史作一考察。

据史料记载,周公自幼仁孝,且“考能”、“多才多艺”,曾先后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即位后,“周公

收稿日期 2016-06-12

作者简介 李 燕(1982—),女,山东济南人,北京教育学院教师教育人文学院讲师,博士。

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①,为翦除殷商和巩固统治立下卓越功绩。从《尚书·金縢》《君奭》《大诰》等篇来看,周公总结夏殷文化并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尚贤”等政治伦理主张,使其成为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

西周中后期以来,周公以其事功及为人受到推重。在他卒后,成王充分肯定其辅佐之功,并特准鲁国行天子礼乐以褒奖其德。据《左传》,吴公子季札聘鲁观乐,听闻《豳》乐而叹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1]襄公二十九年而晋大夫韩宣子聘鲁,见到《易象》与《鲁春秋》,也感叹鲁国保存周礼完备,认为从中可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1]。昭公二年在此,周公被视为治世与道德的典范。

春秋中后期以来,王纲解纽,甚至出现“八佾舞于庭”的乱象^{[2]《八佾》}。孔子洞见周公形象对于维护礼制的重要意义,因而推崇“周公之才之美”^{[2]《泰伯》},晚年更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2]《述而》}孔子对于周公的推崇,正是着眼于其德行、才智与儒家政治理念的内在契合。合诸孔子“吾从周”的论断而观之,周公实已成为周代王道教化的象征。经此转折,周公形象逐渐趋圣化。至战国时期,孟子明确称周公为“古圣人”、“古之君子”^{[3]《公孙丑下》},认为他具有既仁且智、不惧有过而又善于改过的德行。

与此相应,孔子的形象也在悄然变化。当太宰问孔子弟子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答道:“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对此,孔子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2]《子罕》}显然,孔子是不以“圣人”自居的。他自认不过是好学多能的学者和不受重用的政治家,并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2]《述而》}甚至当他与弟子走散而被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时,孔子也只是欣然接受。^②然而,宰我却称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有若更盛赞孔子之“圣”,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3]《公孙丑上》}在这里,仁且智、贤而多能成为孔子之“圣”的主要特征。可见,在其弟子那里,围绕德、能的价值取向,塑造孔子“圣人”形象的工作业已展开。

此后,思孟学派从道、德、性等方面对“圣”、“圣人”进行论证,从而为周、孔并举打通了关节。对此,可结合郭店楚简相关篇章来参看。^③例如,楚简《五行》篇曰:“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④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

①朱维铮主编《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40页)。关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自战国诸子已有特别关注。围绕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众说纷纭,大致存在“摄政称王”、“摄政但未称王”、“既未摄政又未称王”等说法。清华简《金縢》(竹简标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皇门》、《耆夜》等的发现,为此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和视角。详见吕庙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研究述评》(《高校社科动态》2011年第6期);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②孔子多次强调自己只是“学而知之”,并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贡曾以美玉为喻,询问老师是“韞椟而藏”还是“求善贾而沽”,孔子明确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但孔子的理想终于落空,所以他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以上引文见杨树达:《论语疏证》,第165-166、313、220、217页。“丧家之狗”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其曰:“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详见司马迁:《史记》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921-1922页)。此记载又见于《白虎通义·寿命》、《论衡·骨相》、《孔子家语·困誓》、《韩诗外传》卷9,而文有异。

③郭店楚墓下葬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对于其中的《五行》、《成之闻之》篇,学界多认为属子思一系作品。参王永平:《郭店楚简研究综述》,《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为便于刊印,所引简文俱写作通行字,遇有争议则酌情改定并择要注明。

④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简文“圣”作“聖”,《说文》曰:“聖,通也,从耳,呈声。”段玉裁曰:“聖从耳者,谓其耳顺”,《风俗通》曰:“聖者,聲也。言闻聲知情。”按聲、聖字古相假借。”顾颉刚先生认为,“聖”与“聽”相通,从语源学上看,最初为聪明人的意思。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598页);顾颉刚:《“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中国哲学》第1辑,三联书店,1979年,第81页)。

和谐称为“德”,是天道;前四行和谐称为善,属于人道。君子之道即人道,听闻它并且知晓其何以为君子之道的是圣,圣人知晓天道,意即圣人沟通天人之道。《成之闻之》引古君子之言,认为天德是圣人内化天道、天常而形成的圣人之德,圣人之性发挥博大时,圣人便不是中人所能追随效仿的了。^①这种鼓励中人通过自觉实践而尽性的思想倾向,大大淡化了圣人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秘性。

在此基础上,孟、荀进一步将周、孔并举。孟子称赞楚人陈良“悦周公、仲尼之道”^[3]《滕文公上》,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滕文公下》夷夏之辨端在礼乐制度,而禹、周、孔为“三圣”则在于其仁政,则孟子所谓“周公、仲尼之道”实具仁政教化的价值指向。荀子认为,周公辅佐成王,继文武之业,致天下之和,“非圣人莫之能为”,此即“大儒之效”^[4]《儒效》;而孔子仁知且不蔽,“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4]《解蔽》显然,荀子视周公为圣人,又以孔子之德与其相提并论,通过将“大儒”与“圣人”合而论之,使周公与孔子实现了并举。孟、荀关于“圣人”与“君子”、“大儒”并存的表述方式表明,先秦儒家的“圣人之道”虽由周孔之“圣”而得以具体化,却并不完全受其所限制。

二、儒家经典权威的确立

就先秦儒家的“话语形构”而言,除了周、孔形象的圣化,以“六经”为核心的古代典籍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②。通过整理、诠释古代典籍,先秦儒家强调其话语渊源有自。在这其中,“六经”作为圣人言行之印记,逐渐获得了权威地位。

众所周知,早在西周时期,包括“六经”在内的典籍就被应用于王官之学。春秋以降,礼崩乐坏,官学失守。孔子忧王道之不行,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他认为“六经”是圣人因事寓教的载体,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教化意义,因而藉此“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5]《天运》。郭店楚简《六德》也提出:“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狱犴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③简文认为,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夫妇、父子、君臣关系,双方尽到各自的道德义务,就会实现家庭、社会的和谐,“六经”对此皆有体现。至此,“六经”虽然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颇受推重,但尚未取得如后世般绝对尊崇的地位。

《诗》《书》等古代典籍真正成为推阐儒家“圣人之道”的经典,是与孟、荀的创造性诠释分不开的。孟子曾大量称引《诗》《书》,并论及《春秋》和具体的礼、乐制度。如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3]《离娄下》他还提出,面对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局面,孔子惧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滕文公下》显然,孟子论证“迹熄《诗》亡”、“《春秋》继《诗》而起”,意在说明《诗》与《春秋》具有褒善贬恶、维护周礼共同价值的功用,并强调它们在政治教化功能上的衔接与转化^④。荀子也宣称圣人之道蕴含于《诗》《书》等典籍中,他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

①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68页。此处句读及释义参李学勤先生说,见李学勤:《试说郭店简〈成之闻之〉两章》(《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②“六经”并称最早见于《庄子·天运》,以往人们多以该篇晚出而否定此说,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刊布后,学者们对此重新思考。如李学勤先生提出,战国中期儒家已有“六经”之说,廖名春先生认为,六经的形成源于孔子。见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21页);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为行文方便计,本文以“六经”统称古代典籍《诗》、《书》、《礼》、《乐》、《易》、《春秋》,而以儒家“六经”指代经由儒家整理的上述典籍。

③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88页。一般认为,《六德》篇为儒家著作,据考证,该篇当成于子思《中庸》之前,出于孔子或其弟子之手。见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④详参拙文《〈“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南都学坛》(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2期)。

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4]《儒效》在这里,荀子将儒家典籍视为知识与价值的统一体,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六经”之中,孟子独未提及《易》。汉代赵岐曾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3]《孟子题辞》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谓“五经”是就缺《乐》而言,孟子是通《易》的。^①事实上,自汉武帝设立经学博士制度以来,虽然《易》《书》《诗》《礼》《春秋》已经以“五经”的面目出现,但在汉人的认知中,“五经”并不专指上述五种典籍,如《汉书·艺文志》所据《七略》便以“五经”指代《乐》《诗》《礼》《书》《春秋》,而《白虎通·五经》篇更存在“《乐》《书》《礼》《易》《诗》”和“《易》《书》《诗》《礼》《春秋》”两种“五经”说^②。可见,《易》在孟子所构建的经典系统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颇值得深思。退而言之,即如赵岐所言“五经”真的包括《易》,也并不足以证明孟子本人就必然“通《易》”或认同《易》的经典地位,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孟子》确实并无一处明言《易》;而荀子虽曾论及《易》,但较之其他典籍,这种论述明显是零散而居于次要地位的。^③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孟、荀不提《易》或少提《易》并非单纯出于疏忽或无意,它暗示着“在先秦儒家中至少存在着‘五经’和‘六经’两个经典系统的不同。它们之间应该不是历时的关系,而是同时存在着。”^[6]由此观之,较之《易》,《诗》《书》《春秋》等典籍在此时已被孟、荀纳入经典系统的构建中,并已被赋予了神圣的权威意义。

如前所述,“话语”是一个知识讯息传递的过程。为了使其“言之成理”以令社会成员迅速接纳,赋予知识讯息一个开端和结束,进而制造一“完整”、有中心思想的幻象,就是必要的。然则话语的本质永远是动态的、意有所指的,在这点上,它与古人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7]《精华》。既如此,则话语强烈的排他性(exclusion)便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排他性突出地表现为话语对于真(truth)、伪(false)区别的重视上。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3]《尽心下》按照这一思路,周武王至仁,商纣王至不仁,仁者无敌,则周武王伐商纣王断不至于血流漂杵。这种以价值判断替代事实判断的“述说”,实则体现出孟子的王道仁政价值取向。

就话语内部的组织系统而言,“评论”是其所强调的一项功能。如果将经过周、孔之手的“六经”当作一项话语系统的源头,可以发现,孔门后学对此的注释、叙说并不尽一致,不仅有“解”、“传”、“说”、“记”等形式,而且在旨趣上也存在差异,孟子借序《诗》《书》阐发性善、仁政之说,荀子则通过“隆礼义而杀《诗》《书》”强调自己的崇礼治世思想^[4]《儒效》。但就其内在来说,它们互有所属,共同构成了对于“六经”的“评论”形式。质言之,先秦儒家对孔子“述作”的阐论,使得“六经”逐渐成为个别“作者”创作的“作品”。就此而言,儒家“六经”其实是一个广大的作者群之话语“稀释”(rarefaction)的结果。

三、先秦“周孔之道”的生成

由上述分析来看,隐藏在先秦儒家“圣人之道”话语下的意义结构是千头万绪、指涉庞杂的。然

①如姜广辉先生援引宋代二程、清代焦循等学者之语,认为孟子精于《易》。详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②此处所列“五经”均按引文排序。《七略》以文中五者为“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3页)。对于《白虎通·五经》篇“五经”异文现象,陈立认为是“兼存两说”;程苏东则认为,该篇所指“五经”应为除《春秋》之外的五种典籍。见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9(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77页)程苏东:《〈白虎通〉所见“五经”说考论》(《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

③《荀子》言《易》凡四见,如《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大略》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易》之咸,见夫妇。”“善为《易》者不占。”见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6、1054、1059、1077页)。

而,这并不意味着“声明”可以漫无边际的衍生^①。在实际的运作中,得以被表达出来的“声明”是极其有限的,而“‘权力之意欲’及其所挟带的政治斗争的观念,必然是操纵‘声明稀有性’的原动力之一”^[8]。在先秦儒家的话语形构中,“周孔之道”最终得以被表达出来,其实质正是先秦儒家对于重建社会秩序话语权的争取。

正如《汉书》引刘歆《七略》之言曰:“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9]《艺文志》先秦时期,围绕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儒家表现出强烈的弘道意识,而前述思孟学派更进一步从道、德、性等方面对“圣人”展开论证,并致力于“圣人”、“道”、“经”之间的内在贯通。事实上,不惟儒家,为争取重建社会秩序的话语权,其余诸子也纷纷提出各自的“圣人”观念,尊称本派研习典籍为“经”,并对其宗师多加推崇,从而推动了“圣人崇拜思潮”的发生。^②因此,对于孔门后学并举周孔、尊崇“六经”的做法,他们并不认同。例如,当儒者公孟子提出孔子博学多识、明察礼乐,符合上圣标准时,墨子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在墨子的认知中,圣人包括有名有位者(即三代圣王)和有名无位者,不仅要兼具才智、德行,还应“尊天事鬼”、“爱人节用”^[10]《公孟》。因此,他虽然视周公为“圣人”,却不赞成孔子之“圣”。商鞅则将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视为“六虱”,认为国家有此十二者,则“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11]《靳令》韩非子更明确表示,“圣人不可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而儒者“以文乱法”,“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惑人主之心”,实为“五蠹”之一。^[12]《五蠹》韩非子强调以“法治”、“新圣”维护社会秩序、强化国家权力。诸子的这些论述,无疑从最大程度上否定了儒家话语的核心价值。

从话语的内部功能来看,各“声明”之间存在累积性。一旦其中流转的概念发生变化,声明场域本身以及声明之间的关系也会相应变化。事实上,由于时势变迁与认知差异,儒家“圣人之道”话语体系多有变动。例如,上博楚竹书《容成氏》曾围绕“贤”这一重要概念,描述三代古史中圣王“授贤不授子”的社会盛景,以此论证禅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但它同时又肯定了汤、武征伐和传子制;而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则结合“圣”、“仁”,从理论上阐述禅让的广泛性及其重要意义,提出“禅而不传”是“圣之盛”、“仁之至”,认为“不禅而能化民者”自古未有。^[13]但社会现实需求特别是统治阶层的态度,决定了这一理想蓝图无法实现^③,也使得“周孔之道”得以被表达出来。此后,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道统与治统进一步分离,周、孔分祀而孔、孟连称,“孔孟之道”遂取“周孔之道”而代之。

概言之,基于社会失序的现实危机与变革需求,先秦诸子纷纷提出“圣人救世”的思想主张。在这其中,儒家作为观察、感知、记录和教化的主体,通过描述、阐发和辩论等方式形构自身的话语体系。而从前述分析来看,包括“周孔之道”在内的诸多“声明”都是话语运作中暂时淘洗出来的结果,它们也将注定再回归到这一过程中去。

①在傅柯看来,“声明”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种存在的功能。作为话语的基本单位,它不能孤立的运作,而必须在他种声明、句子或命题等形成的关系网络中才能显现其意义。详见米歇·傅柯著,王德威译:《知识的考掘》(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175-244页)。

②如老子提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恒善救人故无弃人”等。诸子对其宗师的称呼也不尽一致,儒、墨皆称其师为“圣人”,如《墨子·公孟》载跌鼻问曰:“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庄子·天下》则称关尹、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见辛战军译注:《老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108页);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63页);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1098页)。

③关于此二篇的学派属性问题,学者多以《唐虞之道》属儒家,但对于《容成氏》则意见不一,概言之,学界观点有诸子说(具体又有儒家、墨家、纵横家等说法)、史书说两种。彭裕商先生认为,二者均为儒家著作,其中对于同一观念的不同记载表明,儒家内部对禅让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且历史上出现过三派并存的局面。本文从彭说。详见彭裕商:《禅让说源流及学派兴衰——以竹书〈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为中心》(《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2):1162,1226-1227.
- [2]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1,196,155,217,175.
- [3]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5(2),316-318,234-236,421,495,617,487,8,1034.
- [4]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61,840,296-297,314.
- [5]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2):531.
- [6]王博.荀子的经典之学[C]//哲学门(总第18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1-70.
- [7]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181.
- [8]米歇尔·傅柯著.知识的考掘[M].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48.
- [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28.
- [10]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454.
- [11]石磊.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1.
- [12]张觉.韩非子校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195,1230.
- [13]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57.

The Pre-Qin Confucian Discursive Forma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

LI Yan

(Faculty of Education for Teacher of Liberal Arts,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12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Doctrine of the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the Pre-Qin Confucian discursive formation. Since the Mid-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acing the realistic crisis and changes in the period, the philosophers had put forward their own thoughts and debated with each other under the thoughts of “sage salvation”. As the subject of observation, perception and moralization, Confucian philosophy propose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for discourse construction. With the increasingly holy image of Zhou and Confucius, the “Six Classics”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ancient Confucian classics and obtained the authority,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 had ultimately been expressed with character sanctification and classic authority.

Key words: Doctrine of the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 the Pre-Qin Confucianism; discursive formation; Sage; *the Six Classics*

(责任编辑 田 军)